

延安时期的中央党校

李忠全 宋易风

中共中央党校，是为我党培养高级干部的主要场所，是运用马列主义教育党员干部的重要阵地。从一九三五年冬党校恢复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撤离延安，在陕北历时十二年多。曾为我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党的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

中央党校在延安，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但在教学、生产以及群众工作等方面却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延安整风运动中成为全党学习的典型；大生产运动中是中直机关的模范。总之，为我党的思想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树立党的三大作风做出了示范，为加速抗战胜利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今天学习和研究我党创办党校的历史，对于贯彻党中央“要把党校办成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办成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模范”的指示，以及认真贯彻执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调动广大干部建设四化的积极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央党校概况

一九三五年十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当时，华北事变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党中央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召开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①为此，党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冬在瓦窑堡（今子长县）恢复了中央党校。

中央党校原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在江西瑞金成立。初名“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学制分为两月、四月和半年，设有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班和高级训练班三个班。开办一期后，由于长征开始，暂时停办。到了瓦窑堡恢复时改为中央党校。中央党校的第一任校长是任弼时，副校长董必武。在瓦窑堡恢复时董必武任校长，开办两期后因为东征暂停招生。一九三六年五月回师河西后继续招生。

一九三六年七月，党校迁保安（今志丹县）住在任家坪一带。十月又迁定边县，住在一所职业学校里。“在这里中央党校成立了少数民族班，廖志高任班主任，天宝任班长。党中央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此时少数民族班已有藏、彝、苗、回等族学

员。”②西安事变后，一九三七年初，中央党校迁往延安，住城东桥儿沟。此时，董必武同志调离，李维汉同志接任校长。

抗日战争开始后，党员数量有了迅速发展，新老干部都有一个重新学习的需要。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党中央在延安先后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如抗大、陕公、鲁艺、女大、延大、民族学院、日本工农学校等。这时，中央党校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学员发展到十一个班，一千余人。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会议后，康生接任校长。这时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党建四个研究室，党校机构逐渐健全。一九三八年十月，六届六中全会后，陈云同志接任中央党校校长，谢觉哉任副校长。由于学校班次不断增多，校舍条件所限，于一九三九年初，党校由桥儿沟迁至延安城北小沟坪（今延安师范住址）。

在这里，中央党校在各个方面比前更加完善，班次增多到五十个，校舍、设备也较齐全，使学员有了一个好的学习条件。一九四一年年底以前，主要是训练党的区、县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共毕业三千多名，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规定：“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并明确规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③这时，陈云同志调中央组织部，邓发同志接任校长。“党校管理委员会由邓发、彭真、陆定一、王鹤寿、胡耀邦五同志组成。”④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中央党校举行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同志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揭开了全党整风的序幕。整风期间，党校先后曾两次进行改组：二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决定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织管理委员会管理（原管理委员会取消）。邓发任校长并主持校务会议，彭真任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会议，林彪主持军事教育会议。党校的整风学习由彭真负责。”⑤

党校秘书长黄火青，教育主任张秀山，副主任刘芝明、杨献珍。校务部长胡松，副部长牟洋衡。此外还有总务处，武能光任处长。⑥

一九四三年，全党普遍整风结束后，为了准备高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三月二十日，中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中央党校归宣传委员会管理。邓发调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任副校长。”⑦改组后，中央党校以后扩大为六个部。每部各有培训重点。

一部为原党校基础，是地委、旅级以上干部（多为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主任古大存，副主任刘芝明，住小沟坪；二部是以女大为基础，为地方中级干部和军队团级干部、主任张鼎丞，副主任安子文，住王家坪；三部以中央研究院为基础，以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为主，主任郭述申，副主任张如心，住兰家坪；四部是以军事学院为基础，多为工农老干部，主任张启龙，副主任程世才，住大砭沟；五、六部是以西北局党校为主，五部以陕甘宁边区县级干部为主，主任向栋材，副主任强晓初，住七里铺（滑石砭）；六部是从敌后和国统区来的县、区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主任马国瑞，副主任谷云亭，住马家

湾。⑧中央党校校部仍设在小沟坪。

一九四七年三月，蔣胡匪军侵犯延安，中央党校由小沟坪撤离，随中央转移。在安子文同志带领下过黄河经五台去太行，党校工作暂告结束。

二、中央党校是怎样培训党员干部的

中央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学校，它不同其它干部学校的教育。尽管学员都是党员干部，但由于战争环境的需要，有些同志很快入了党，并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广大党员对党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但由于缺乏马列主义教育，脑子里还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特别是一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往往表现出在政治上左右摇摆，思想方法上主观片面，组织纪律上自由散漫的弱点。因而易被教条主义所利用，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情况在延安当时极为严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⑨

面对着党员思想上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怎样进行教育和提高他们呢？党校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有步骤，有目的地进行培训，使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成为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一）学习理论与改造思想相结合

第一、明确培养目标，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学员头脑。

我党成立以来，由于立即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学习和教育注重不够，加之后来批教条主义，又使一些人轻视理论的学习。中央党校开办后，由于每期时间短、入学人数少，加上开设课程多（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党史、中国问题、军事课和文化课、马列主义等）。学员在较短时间内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中央党校开办以来，培养目的是明确的，从始至终都强调一定要学好理论。在江西的第一期时，就明确规定教学的宗旨：“其目的是要用马列主义武器来武装同志们的头脑”。⑩在延安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强调指出：“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⑪因此，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强调“各级党校的基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来教育干部，而来校干部的基本任务也就是学习。”中央党校特别注意对学员加强理论学习和研究，后来的实践证明党校这样的作法是正确的。

以中央党校一九四二年开设的课程为例，就可以看出对学习理论的重视。除了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外，仅马列主义课一项要占所有学习时间的百分之二十三，将近四分之一。为了加强讲授，除专职教员外，还请延安的中央委员和专门学者讲课。如毛泽东同志给党校学员讲授哲学，范文澜、艾思奇等为各种专门课程的教员。党中央一九四〇年又规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因此在延安，曾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中央陆续出版印发了许多马列主

义原著，有力地配合了教学。特别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党校给高干规定了学习内容，马列主义原著学习更多。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开始学习好多同志都感到吃力，还有些同志坐不下来，认为前方打仗，让他们坐下学习，一时想不通还闹情绪。党校采取了各种措施解决学员思想问题，加强理论的学习。如请译书翻译讲背景、开设文化课弥补水平低的同志。毛泽东同志说：“我党中央现在强调工农干部学习文化，因为学了文化以后，政治、军事、经济那一门都可以学。否则工农干部虽有丰富经验，却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可能。”^⑫同时为了帮助学员学习，党校定期出版《学习报》，由陆定一同志主编。引导学员领会马列原著中的精神实质。经过同志们的刻苦努力，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在许多老同志回忆起这段历史时都深有体会地说：要说真正地学习了些马列主义，那点老底子就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打下的。

第二、制订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的教学方针：

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总结了开办党校以来的教学经验，张闻天同志首次阐明了党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特别着重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精神与方法的教育，着重于拿实际问题说明马列主义的原则。”并应“依照程度，由浅入深，由近（中国）到远（国外），由具体到抽象，由少到多；以启发、发挥自动性，真能懂得为原则；不要贪多，不要好高骛远，多采讨论方式。”^⑬这样在如何学习理论上就比前明确了，所以在具体实施中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学到了不少马列主义的理论。但后来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也曾出现了一些偏向，如有的教员讲《资本论》，从理论上讲的头头是道，但自己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伪币作斗争的问题；学员在延安学了到酃县就不会用；有的讲《联共党史》一次讲两章，学员理解不了，有的工农同志由于水平有限，甚至连页码也一时找不到。诸如此类的事，在延安中央党校也出现过不少。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员中造成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的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对此，毛泽东同志又在总结干部教育中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⑭

中央党校结合自己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干部学校的教学方针确定为党校的教学方针。为贯彻好此方针，在具体实施中对原来所设课程进行了新的调整。中国问题要占百分之十七，党的方针政策和时事占百分之三十四。一周内还专门设立一天为党日，为贯彻教学方针起了促进作用。这样，使学员将自己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通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能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这个方针的贯彻在中央党校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有一位老同志回忆说：念一些马列主义词句开始感到不容易，后来死记硬背也就记住了。但真正能运用到自己的实际才不容易，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慢慢体会马列主义的精神，对照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去思考，才感到有意思。这中间真正有一个艰苦的过程。

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又是以党校作为重点而进行的，这是全党同志学习马列主义的极好机会。党中央对这次整风学习特别重视，于一九四一年就进行筹备，接着进行考试录取学员进入党校。整风开始

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了整风的任务和目的，并作了重要讲话。但是运动刚开始后，有一些同志却背离了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精神。本来，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是以整顿三风，树立三大作风作为根本任务的。“其中尤以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为核心。”^⑤学校领导一度依然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来领导学习，唯一要求还是死啃书本，争论名词，不引导大家真正去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也不用这个理论去联系指导自己的实际，成了无的放矢。把党校的整风运动搞的冷冷清清，这样下去风是整不好的，思想革命的任务是完不成的。

针对着这种情况，党中央对党校进行了两次改组。为加强领导和完成整风任务，并进行了教育上的革命，改造了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提出了整风中党校教学的新方针。“理论与实践的一致，克服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力求从实际出发，学习掌握理论方法，这是党校教育的新方针。”^⑥在制定这个新的教学方针之前，就征求了所有学员对教学上的意见，确定教育内容。将以辛亥革命至今的中国历史为基础，以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了解中国的基本问题。其中包括各个时期各种革命的政治环境、党的思想方法、党的政策，以及组织问题、军事问题。使党的建设，哲学思想等类课程，得以有机的联系起来，不致再行割裂，理论与实际脱节。要贯彻党校这个新方针，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以及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真正贯彻到教育工作和学习方法中去。即先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中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党校的整风运动就顺利地开展了，并成为理论联系实际典型。

第三，拿起批评武器，认真改造思想：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校的同志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⑦中央党校的学员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认真地学习了革命理论，领会其精神实质，不断提高认识。然后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对照检查，每个人都写心得笔记（反省笔记）。反省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思想上和工作上有重大的转变的起点。没有反省，转变是不能达到的。这就是把学习理论和改造思想紧密结合起来。当时就我们党的状况看，大多数党员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八十万党员，百分之九十是新党员，新党员中百分之九十是小资产阶级或半无产阶级出身（农民和知识分子）〉要把这些人变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不经过思想上的改造和思想上的革命，是不可能的。当年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的许多老同志，在这方面都有很好的经验。邓颖超同志回忆说：通过学习理论、对照检查“加强了改造思想的决心，鞭策自己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上力图使动机与效果统一，少犯和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通过这次整风学习，我确实有很大收获。”^⑧她深有体会的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终身坚持不懈的任务。”

在中央党校学习，学员们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又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在延安整风中，中央党校为树立党的三大作风起了带头作用，成为全党整风运动中的极好典型。为我党思想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二）勤俭办校，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中央党校自从开办以来，从江西经过长征到陕北，直至在延安期间，都始终坚持勤俭办校的原则。这已成为党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校的教职员，一面学习，一面抽出时间参加生产劳动。这样既克服了物质困难，使同志们得到了锻炼，又改善了生活，保证了教学。

第一，坚持勤俭办校的好传统

中央党校在延安的前两年，曾先后转移四处地方，每处都没有一个好的校舍，教学设置更为简单。如初到陕北瓦窑堡时，校舍仅有几孔窑洞，在保安就在大树底下上课，校部只有一张木桌和木凳，晚上十几个人挤在一盏油灯下看书学习；到延安桥儿沟后，天主教堂成了唯一的活动场所；移住延安北门外小沟坪时，环境仍很艰苦，连容纳数百人的礼堂都没有。大家只好暂时住在群众让出的破窑和烂庙、牛棚、马厩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同志们一方面坚持学习，一方面凭借着自己劳动的双手，建设起了整洁的窑洞和校舍。先后打窑洞一千余孔，房子百余间。

一九四〇年秋，中央党校拟定了一个自建大礼堂的计划，“自己设计，自己施工：木料到山上去砍，石头去开山，火砖自己打。十月二日动工，一个多月就建成。（这座礼堂面积共四十平方丈，样子为平屋假楼式。长十丈，宽四丈，共十间，六个门，二十多个窗，可容千余人）。”^①礼堂内没有固定坐位，听课时自带小凳。毛泽东同志《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就在这座礼堂里作的。后来因学工人数增多，改作党校的食堂。

“一九四三年，他们仅用了一百天时间又修起了一座可容两千余人的大礼堂（平面丁字形，正面十丈，全长十三丈，总面积九千一百多平方公尺），为国家节省工料费九百九十三万三千元。”^②就在这座礼堂建成后，党校领导请毛泽东同志题个字，毛主席在枣园书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镶嵌在礼堂正面的墙壁上，成了党校全体同志的座右铭和党校的宗旨。从此，党中央的许多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作过《学习和时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报告。^③

中央党校在勤俭办校方面的事迹是多方面的，除自建大礼堂外，还办起修理铺。从一九四三年一月起到九月，修焊了全校汽灯、水壶等用具，并制做了许多东西，如铜印、墨盒、三胆灯、水箱、刀子、锁子、缝纫机、纺毛线筒及喷壶等，共计修焊了九千六百六十六件，且对外做生意，赚钱二万六千三百九十八元。^④修理铺李全孝同志自制成一种自开锁，在中直、军直第二届展览会上受到称赞。又因为没有时钟，上课学习不便，党校人员就用石头制成一个石日晷，以便看太阳影子，测定作息时间（此晷现展出在延安革命纪念馆）。^⑤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使他们在思想上树立了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二，贯彻生产劳动的好精神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加之自然灾害，造成了边区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要求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生产自给。当时中央党校粮食

不足、油盐不足,蔬菜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冬天来了,每人发给三斤羊毛代替棉絮。就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向全体学员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指示。^{②4}从一九三九年就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党校于生产运动中先后开办了三个农场和十几个手工作坊。从而克服了困难,节省了开支,改善了生活,保证了教学。

党校的大生产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出现了不少动人事迹。五部五百多名同学上山开荒在延安很有影响,因为这批同学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开过荒,有人过去都没见过山,而他们的生产热情却非常高。虽然个个手上打起了许多水泡,也不叫苦,有些同志还偷偷地组织自愿开荒队,利用休息时间,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继续进行着开荒生产。后来生产运动深入发展,党校南泥湾农场一九四三年就收细粮七百石。为了冬季取暖,学校动员了一些勤务员、通讯员、炊事员等组织起烧木炭队。三个队吃住在野外,两个月烧木炭七十万斤。特别是第二队创造了全边区生产运动中烧木炭的奇迹,最大炭窖可容两千斤,最大的一块木炭一百六十斤,一个中等的也一百二十斤。在送往边区生产展览会途中,不慎将大块的摔碎,一百二十斤的也成为展览会上的冠军;^{②5}同时组织运输队驮盐,每驮获利二千元;此外还开设豆腐房、养猪坊、木料坊、制烟厂、缝纫组等小型手工业作坊。一九四二年就达到了粮食基本自给,副食自给有余。在原有基础上,一九四三年扩大种菜二百亩。种菜能手黄立德成为全边区公认的劳动模范;学员巨秀林一年生产粮食六石。总之,中央党校全体学工人员,自投入生产运动后,一九四二年就收入将近四十余万元,连同商业收入共可达近百万元。一九四三年又扩大种菜三百亩,收菜七十五万斤,饲料四千零五石;一九四三年还收烟叶三万斤,收入达一百八十一万八千元;工作人员又种麻籽和黑豆三百亩,使每人每天平均七钱油,三两豆腐有了可靠保证。中央党校的生产运动搞得很好,受到党中央的嘉奖,还被评为中直机关的模范。^{②6}

第三,厉行节约的好作风

中央党校在开展生产和整风的基础上,从上到下开展了节约运动,这也是党校一贯的好作风。党校初到陕北时,当他们接到中央政府关于节省粮食的命令后,立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节省意义与实际节省办法,作出了四项决议:

一、每人每天节省粮食一两交公家。

二、每星期日派宣传队到乡村向群众宣传节省粮食,把余粮借给政府。

三、要求本校工作人员与全体学员,凡是家在苏区的同志,都写信动员家里节省粮食借给红军。

四、健全经济委员会工作,严格检查,消灭浪费现象,并发动全体同志参加菜园的耕作,多种瓜菜。^{②7}

当时由于生产自足,丰衣足食,也出现过一些浪费现象,如剩饭经常有几十条猪吃不了,桌凳木工厂专有三人修理,犹供给不上。但很快就得到了扭转。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四月,全校节省粮食六十四石五升六合;两月节约石炭四千一百一十九斤半。^{②8}

(三)学习理论和做群众工作相结合

中央党校自从成立后,就明确规定学员在校学习要和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让学员

下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认真做好群众工作。比如在江西时，学员在学习期间，就开展慰劳红军、募集公债、动员群众参军、帮助烈军属劳动、为战士打草鞋、组织宣传队深入基层进行宣传等活动。将党的方针政策给群众宣传，同时听取群众的反映和要求。

达陕北后，在教学安排上，就专门规定：“为密切党群关系、学工人员要经常帮助当地群众劳动，办冬学、识字班”。此外，“在延安时，还专门派干部到陇东、关中、三边帮助群众开展冬学”。^{②⑨}这方面事例也很多，现仅举几例。

党校在瓦窑堡时，学校工会班利用星期日派一批学生到离校十几里路的高庄和杨庄去帮助红军家属锄地。老乡感动地说：“这是第一次见到对红属这样的优待，过去我们受白匪压迫，不敢说是红军，以前你们来的时候，我们也不敢立刻说实话，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你们有这样好，而今天我们不怕了”。^{③⑩}

党校每走一地都不忘记做群众工作，通过帮助群众劳动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和当地群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至今延安广大群众还留传着：“中央党校好作风，帮助群众常劳动，不要工钱不吃饭，还给我们搞宣传。”

中央党校俱乐部经常对外开放。每逢过年过节、凡举行文艺晚会、都请周围群众来参加观看。他们为了活跃群众生活，扩大宣传，还专门组织了文艺宣传队下到农村为群众演戏剧、秧歌。比如《逼上梁山》、《俄罗斯人》等剧的演出很受群众欢迎。

通过以上各种方式，更加密切地联系了群众，使群众更加了解我们党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也使学员得到锻炼和提高，学会了做群众工作。在动员群众参加抗战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我党创办党校的经验教训

中央党校从一九三三年成立起到一九四七年三月撤离延安，十三年里为党培养了大批的领导骨干，同时，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成功经验，在中国革命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也存在不少缺陷。）

第一，加强领导是办好党校的前提条件。

中央党校开办后就直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工作。所以，从学校领导的配备到教学计划的制定，都是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帮助下确定的。最为明显的是：党中央为创办好党校，每个阶段都选派一些中央领导或强有力的同志担任校长和教员，许多中央委员及各部门负责同志兼任讲课。党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延安中央党校组织机构》等许多文件，使党校工作顺利进展。延安整风开始后，中央将党校列为全党整风的重点。中央负责同志经常了解情况，具体进行指导。毛泽东同志还亲自看整风墙报，多次给党校学员讲话；刘少奇同志来党校参加民主大会的讨论；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经常给党校学员做形势报告。因此一发现问题就能及时进行改进。中央党校在整风中间一度两次进行改组、加强领导，改进教学方针。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一点是：党校始终设有一个由数人组成的党校管理委员会，党的工作与教学工作分开。学校重大问题都由管理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当然管理委员会也有明确分工，各自负责一个方面。这样既能调动每个领导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特长，又能集思广益，防止个人专断独行。这种

集体领导，人人负责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二，充分发扬民主是办好党校的根本途径

中央党校所以能办得比较好，得到中央的称赞和人民的拥护。除了加强领导外，很重要的一条是：党校领导能够依靠、相信广大学员，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认识问题。引导学员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提出怀疑的问题，然后开展争论。比如在瓦窑堡，学员讨论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联系中国当前形势，对关于人民共和国问题争论起来。有的学员说：“如果把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要那些资产阶级也到我们政府里来，好像一盆洁白的牛奶，掉进一只苍蝇似的，那多脏呀！”后经周恩来同志解答统一了认识。^{③①}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中央党校集中了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如何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怎样发扬民主？毛泽东同志对在党校学习的一些负责同志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统统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从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会更加团结了”。毛主席还给他们介绍说：“边区一家老乡给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乡很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而不敢言，现在他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员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有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③②}因此，党校在发扬民主方面是作的很好的，敢让人讲话。有一位团长，别人说他个人英雄主义，他接受不了，要求答辩。在民主大会上讲了一天，听众都有些不耐烦了，但学校领导还是让他讲完。但是，学校领导对学员提出的问题或自己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从不含糊其词，也不急于作结论，而让学员在学习理论和文件的基础上，自己去解决，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位团长就是在自己发言之后，认真听取了同志们的意见，对照文件检查，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缺点，后来在战壕上表现得很英勇。还有党校四部十支书记王加善同志（他原为四方面军的一个团长），讲了一个自己深刻的体会。他说：“在中央党校整风学习时，开始让放、什么都可以讲，但最后通过落实要自己解决问题。我们为一、二、四方面军与陕北红军之间的关系引起了争论。当时记得中央有个文件，强调了一方面军的成绩，没有全面地来估计二、四方面军的同志，所以我们就不服气，先是在下面吵，然后去找上级，闹得很厉害。但争来争去，领导上也不给评个理，就让学习文件，提高认识。最后让我们自己去解决。毛主席终于将同志们团结起来了。”^{③③}中央党校在延安这种生动活泼的局面，人人心情舒畅的精神面貌，就是来自发扬民主的结果。今天这点更应值得我们发扬。

第三，搞好后勤管理是办好党校的可靠保证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的后勤管理工作搞得非常出色，它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解放日报》曾经多次推广过他们的经验。尽管当时战争年代实行供给制，但学校后勤上的一切安排合情合理，从未发生过什么大的缺陷。实行生产自给后，学校实行自给管理，即家务管理的好，收入多的可首先安排好本单位自己的生活，行政经费可自行支配，多余部分上交公家有奖，这样对于调动各个单位及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起到促进作用。

在党校一直专门设立校务部，主管学校的一切行政事务。下设三个科：生产科、总

务科、油印科分别管理吃穿住行、生产劳动、伙食管理、文艺体育、材料供给等。这些行政人员虽然较少，但想尽了一切办法搞好行政管理。校务部及时制定《十大公约》、《学校供给标准》等，下属各科都按标准去执行。比如生产科，为搞好农副业生产，除发动全体学员在学校附近劳动以外，为完成上级任务，还专门组织了一百四十余人的生产专业队去农场劳动。生产科对这支劳动大军管理也较得法，每逢节日派专车接回学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请他们参加十月革命欢迎晚会，让生产人员参观中直生产展览会，总结生产经验，以鼓士气。在全校发行《丰衣足食报》，《群众快报》，开展竞赛，评比模范，颁发奖品，交流经验，推动了生产运动的开展。总务科除了办好合作社的食堂外，重点抓伙食管理。他们研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和节约办法，收到好的效果。比如全校实行了集体吃饭制度，用品限期使用制，（如一个灯罩用一年）这样提高了事务人员管理家务和爱护公物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此外规定：食堂厨房节省出来的东西，米以10%、炭以50%、油以市价1/3作为事务人员的私人生产。同时把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联系起来进行，使公私利益很好结合起来。油印科就在纸张困难的条件下，也没中断教学的需要。总之，党校后勤管理方面真正做到细致耐心，服务周到，供给及时。在各方面配合下，为完成教学任务作出了贡献。

在总结我党创办党校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应看到由于战争条件所限，还存在着许多缺陷。比如整风运动中党校一度背离中央的整风精神，使运动冷冷清清，教条主义一时未能铲除；（后在中央指导下纠正了）开展答辩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使一些同志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回答不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还有，战时需要干部，有时两三个月就要培训一期，这些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这些不足并未影响中央党校工作的全局，作为战时在延安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是我党建设事业发展中极为光辉的一页。

附后：

- ① 见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492页）
- ② 见《百科知识》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 ③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 ④ 见《金力静同志在延安回忆》
- ⑤⑦⑬ 见《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中央党校的历史概况）
- ⑥ 见《武能光同志在延安回忆》
- ⑧ 见《刘晋、王加善同志在延安的回忆》
- ⑨ 见毛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32页）
- ⑩ 见《肖锋日记》一九三三年三月
- ⑪ 见毛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499页）
- ⑫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六日

- ⑭ 见毛选《改造我们的学习》（760页）
- ⑮ 见《星火灯原》第六期 张鼎承（整风在延安中央党校）
- ⑯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 ⑰ 见毛选《整顿党的作风》（773页）
- ⑱ 见邓颖超《欢庆与回忆》（《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 ⑲ 见《新中华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
- ⑳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 ㉑㉒㉓ 见《延安纪念馆档案卷》（2—9—80页）
- ㉔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㉕㉖ 《星火灯原》第六期 程悦长《难忘的教诲》
- ㉗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 ㉘ 见《红色中华》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 ㉙ 见《解放日报》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二日
- ㉚ 见《延安纪念馆档案卷》（2—9—112页）。
- ㉛ 见《红色中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 ㉜ 见《星火灯原》第二期 刘占江（保卫瓦窑堡）
- ㉝ 见《王加善同志在延安的回忆》